

母亲的单调生活

□ 余博超

印象中,我的母亲好似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喜好,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待在家中,做着仿佛专属于她的家务。因此我天真地认为,母亲的生活十分单调。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父亲受其朋友盛情邀请,便计划着我们全家到长沙去游玩,但是母亲却执意让父亲一人带着我去,她则要留在家中做着永远都做不完的家务。对于母亲的意见,父亲是尊重的,但他更愿意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游玩。所以父亲让我做一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其实面对母亲,我有着一招杀手锏,那就是对她说:“妈妈,你这样会扫我兴的。”

母亲尤其照顾我的情绪,故而当我使用杀手锏时,母亲只得跳出她那单调的生活,同父亲和我出发去长沙游玩了。起初,进入火车站时,母亲牢牢攥紧父亲的手,她好似一只风筝,并不知道她该去哪,只是将自己的方向交由持线人的手中。待到父亲带着母亲落座后,母亲紧张的状态才渐渐松弛,她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显得有些激动。她对着我说:“这儿,我好像来过。”我感到十分诧异,在我印象中,母亲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在网购还不发达的年代她独自一人去过最远的地方无非就是大中路步行街为我购置新年的衣裳,如今网购兴盛,她也就到菜市场去购买食材。母亲居然还出过远门?在父亲的讲述下,我对于母亲才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母亲出生在一个名叫赵子亦注的小村庄,作为家中的幺女,即使在那个物质生活尚不完全发达的年代,她也没受过什么苦。据母亲跟我讲,她小学的班主任那时为了规劝她刻苦读书,便对她说道:“不用功读书的话,将来就只能在乡下种田。”母亲语出惊人,对着她的班主任回答道:“如果人人都不种田、不劳动,都坐在办公室里,那老百姓吃什么?”

我的母亲为了践行她的名言,在十六岁的时候便离开了学校,来到了九江进入当时的九玻厂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国企工人。我的舅舅那时是九玻厂的一名中层干部,有意培养我的母亲,于是只要有机会便会安排母亲到外地去交流学习,那个时候,母亲去了很多的地方,她也十分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直到她遇见了我的父亲生下了我之后,她便不愿意再出去了。因为那时母亲和父亲都忙着工作,只得请保姆来照顾我。而请别人来照顾我,母亲总归是不放心的,于是在九玻厂重组为巨石集团之际,她找到了我舅舅,在“威逼利诱”下我舅舅只得给她调岗,好让她能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儿子。

父亲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打趣地说道:“崽,你要好好对妈妈。你之所以能给在青葱岁月无忧无虑地走南闯北,是因为你窃取了妈妈享受人生的权利。”我直愣愣地看着母亲,她正拿着手机准备拍摄下窗外转瞬即逝的美景,突然瞥见我望着她,赶忙将手机放下,笑盈盈地看着我。

抵达长沙正值晚饭时间,父亲的友人便为我们接风洗尘,酒足饭饱后他提议由他带着我们去游玩,父亲怕麻烦到他便委婉地拒绝了,这正符合母亲的心意。自此将全身心都投入到照顾我之后,她便没有其余的精力同外人打交道,因此母亲对于人际交往是避之不及的,就连过年时要到舅舅家去拜年她都准备委托父亲和我全权代表。

当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的时候,母亲显得很开心,她破天荒地提出想去五一广场转转。彼时已是深夜,但长沙的夜市是出了名的。街道上人头攒动,商铺中所散发的光线仿佛彩铅一般在夜幕编织成的画布上描绘着人间盛世的景象。那夜我不关心世界,我只想为我的母亲照相。镜头下的母亲仿佛

回归到她原本的生活,那淡雅却精致的妆容在靓丽的景色下是显得那么美艳动人。可是,她在日常的生活中,从不淡妆浓抹,也不愿走进宜人的风景中,甚至从长沙返程的途中,她都在念叨:“你们再留在长沙多玩几天,我先回去搞下家里的卫生,这样你们回去家里也干净些。”,我明白,看似母亲热衷单调的生活,其实是母亲将她的快乐慷慨地赠予了我。

其实我又何止窃取了她享受人生的权利呢?连她心海的波动都被我一并给偷走了。那时,我担心毕业后就与大学同学天各一方难有碰面的机会,于是极力邀请他们前来九江游玩。本是一餐应当祝福“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宴会,却在推杯换盏间不自觉演变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散伙饭”。我们几人本就不胜酒力,却在情绪作祟下都喝得个酩酊大醉。我委托好友将他们送至下榻的酒店后,便独自一人回了家中。夜深人静,只有母亲那担忧的心跳在与时针做着搏斗所发出的声音。母亲看见我回来之后,赶忙过来搀扶我,她一边悉心照料着我一边耐心倾听着我对过往生活的不舍与对未来生活的畏缩。

有人将母亲比作天,我却想将我的母亲比作海。我从她的身体中来到了没有污染的云端,从而使我能自由地去感受水潭的平淡和溪流的浪漫,而她只是在我能望见的终点处静静地等着我的到来。

我终于懂得了为什么母亲心甘情愿地选择那单调的生活。其实是她将我完整地融入了她的心中,为此她几乎放弃了全部的自己,将我的人生凌驾在她的生活之上。

母亲因我而舍弃的,今生今世我都无以回报。我仅希望,能将自己的人生注入更多的色彩,从而对得起母亲生活中所缺失的绚烂。

岁月里的母爱与觉醒

□ 巫罗燕

1957年,赣南的群山还笼罩在薄雾里,母亲在山坳间的小村庄呱呱坠地。物资匮乏的年代,贫穷像藤蔓般缠绕着这个家。九岁那年,体弱多病的外祖母无力照料襁褓中的儿子,母亲攥着刚焐热的铅笔,只在学堂坐了短短一个月,便被迫辍学。当同龄孩子还在田埂上追逐嬉戏,她已背着竹篓拾柴火,蹲在池塘边搓洗尿布,牵着老黄牛走过蜿蜒的山路。那些写满生字的课本,终究成了她一生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与同村的父亲结为连理。灶台的烟火、田间的泥泞、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将她的青春岁月填得满满当当。日子清贫如洗,她却把苦涩嚼碎了咽进肚里,嘴角始终挂着温暖的笑。

没读过书的母亲,却有着惊人的心算天赋。我读小学时,为了贴补家用,她在院里搭起鸡窝,在后山种下香菇,天不亮就挑着豆腐走街串巷。有次卖莲子,老板算完账,母亲指尖摩挲着钞票,笃定道:“钱数不对。”父亲憨厚地摆摆手,她却执意让父亲用计算器再算。我好奇地用草稿纸验算,果然发现少了几十元。老板涨红着脸解释计算器出了故障,那一刻,我望着母亲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第一次读懂了什么叫“生活磨砺出的智慧”。

作为家中老三,我曾是母亲“重男轻女”思想的叛逆者。听长辈说,当年为了生弟弟,我险些被送人。孩童的我满心愤懑,只要弟弟的玩具比我新,水果比我大,我定会哭闹争抢,哪怕将玩具摔得粉碎,也不愿让他得逞。那些幼稚的反抗背后,藏着的是对公平的渴望,是一个小女孩渴望被爱的执着。

“姐,妈在校门口卖鸡脚爪(野果子,药名:枳椇)呢!”弟弟的话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我本能地想冲出去,却在教室门口刹住了脚步。青春期的虚荣心作祟,我生怕同学看见母亲佝偻着背叫卖的模样。我强装镇定地对弟弟说:“作业没写完,让妈先回去吧。”放学时,弟弟塞给我皱巴巴的二十元生活费,那带着体温的纸币,让我喉咙发紧。

高中离家求学,每月一次的归家成了母亲的盛大节日。她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攒鸡蛋,变着花样做红烧肉、红烧鱼块。临行前,总要我书包里塞两罐奶粉、几袋饼干。那时的我却嫌行李太重,抱怨不是自己想要的名牌。直到多年后,在异乡的深夜,我才突然想起那些被嫌弃的饼干,原是母亲跑了几个店铺才买到的。

大学那年,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大学。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执意要送我们,我和弟弟却以耽误农时为由拒绝了。其实我心里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害怕同学看见父母时穿的布鞋,听着他们带着乡音的话语。母亲却笑着对邻居说:“孩子们懂事,怕误了莲子收成。”望着她眼底的失落,我第一次为自己的虚荣感到羞愧。

11年前,母亲成了奶奶,独自到县城照顾孙子孙女。本该安享晚年的她,却又闲不住。清晨五点,她就跟着父亲去菜园摘菜;傍晚时分,在小区门口支起小摊。我们姐弟轮番劝说,她总说:“能帮你弟减轻点负担是一点。”据说有次姐姐话说重了,母亲躲在厨房抹眼泪,却又在姐姐进门时笑着端出刚烧好的红烧肉。远在他乡的我,听到姐妹们的“投诉”,也

会时不时打电话劝说母亲,可每次没说几句,她就找借口挂掉电话。弟弟和弟媳都是体制内的干部,在小县城养育两个孩子,经济压力并不大,他们也坚决反对母亲这么辛苦地去卖菜,只希望母亲能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回顾母亲的一生,她似乎永远在忙碌。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春日挖藕,她弯腰的身影与水田融为一体;盛夏采莲,汗水浸透她的粗布衣衫;深秋割稻,她单薄的肩膀能挑起百斤稻谷;寒冬挖笋,她的双手布满冻疮却从未停歇。那个瘦小身影,蕴藏着足以撑起整个家的力量。

如今,我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深夜给娃掖被子时,看着熟睡的孩子,突然理解了母亲当年的不易。在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父亲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延续香火被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向来温婉贤淑、恪守孝道,又如何忍心让长辈们的殷切期盼化作泡影?那些曾让我耿耿于怀的偏见,那些被我忽视的付出,在岁月的沉淀中渐渐清晰。原来母爱不是完美无缺的艺术品,而是浸透汗水与泪水的生活本身。

自识字以来,我的笔端流淌过父亲憨厚的背影,勾勒过挚友畅谈的剪影,描绘过师长谆谆的教诲,却始终不敢触碰那个在字典里找不到名字的身影——我那目不识丁的母亲。她的故事藏在皱褶的围裙口袋里,躲在灶台升腾的蒸汽里,而我那支自以为是的钢笔,竟从未敢掀开这最温暖的篇章。今年母亲节来临之际,我终于有勇气写下这些文字。母亲啊,您用一生的操劳教会我成长,而我对您的爱,就藏在这字里行间,绵长而深沉。